

第六章

接生员

1947年，玉米收获。怀有五个月身孕的杨安秀在拖了一整天的玉米之后，流产了。她当时十七岁。丈夫没在屋里，跑兵役呢，婆子妈住到那一面（三间屋），我跟大嫂一家住了半间，晚上也没的亮，那么身上蛮流血，下坠的不行，我说：“是那么的？”最后我都承到床头起，到后半夜下坠逼得没法，我就跪到地下呻唤。

第二早晨我大嫂说：“昨晚上听到你呻唤了一声都没有呻唤了，白天都是上好的人，那么的？”我说，“嫂嫂你进来看面前流的啥？”又没的灯亮，是朦月子，我说是血呀似的，好象落了个啥，还有个带带呢。最后嫂嫂看了一下说：“哎呀，小月了，你龟儿！”头都有这么大了，身子也有长度。嫂子弄火钳夹到板板上，说叫我妈看看，说我小月了。

妈没开腔，后说：“那有啥关系？几个月小月了有啥意思？不咋得！”嫂子说：“得给弄点啥吃一下，脸黄的不行”。我就弄旧裤子到我身上巴到（贴）起，睡倒。最后妈说：“喔怕啥？简直说的还吃一下！我们那时都七个月了小月了都没有做个啥。”

到屋里只呆了三天。最后点麦子哩又才出去点麦子，插田。有空了我经常都哭，想这是那么子一回事情？给了这么穷的婆婆家。流了产啥都不那个（照顾）。

三年后，195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再次有了身孕的安秀即将分娩。革命尚未改变她的家庭关系，也未触及到地方上生孩子的方法和生孩子的危险等问题。发现疼，我也没吭气儿。婆子脾气大的很。“究竟知道是不是要生了？”你一说，她会说：“你不嫌羞人还说呢！生娃是自然现象。”我一直都没敢开腔，就走到这走到那。晌午，我说去擀点面吃，直接都没法了。我才去烙摊馍，煮了给我妈留了一碗，我舀了一碗，光把汤喝了没法吃。

到下午，原听那些老年人说，走走要好些子，我可能肚子也不疼，光是后腰疼，就象弄了个不利的锯在坠我，恼火的很。我就靠到这靠到那，到黑了，我一个大娘家的姐姐来了，说：“你腰疼的很吗？叫接生的。”当时产婆的价钱是一只鸡、一块三尺的红布、一双鞋、一斗麦子、钱。¹我说算了不叫。再一

¹ 中国的计量方法，分别为一尺和一斗。

个我看到她在我们隔壁接了生，看到害怕的没法，她把这一只手放到阴道里去了。就象整个到田里挖秧，掏的响嘛！我看见嫌害怕，她手放进去，产妇眼睛都翻上去了。所以我说算了算了，我们又没的钱，旬分开，吃饭都成问题，你请个人干啥呀？

哎哟这一天了，把人逼得，你要人的命了。最后我把手按到这个地方，靠到床帮上，她坐到小凳子上两只手这样子承起，最后我说这一天还是这扶起，这咋办呀么？我们对象又没在屋里。我又想上厕所，她说你上嘛，我大姐蹲到地下，弄了一块布承到她手上，脐带子太短，一乍多长（约五寸）最后我大姐就接到手上，那时都没经过这个事情，扯会阴，她也不晓得，我一身疼的那肉都跳，十点钟生了的到半晚上疼的这全部都发肿了。

是五月十八生的，天热的很。一天都这么侧着躺床上，吃饭都端来。最后第四天晚上我丈夫回来，他说你这一些都睡了。我说是。他出去到灶房里，婆子妈封建的很，说：“你又到屋里去了的呵？”“去了的，咋哩？”“安秀生了，你黑了回来的就跑到屋里去？”意思是咋不到外面打个转转，把啥（不祥的东西）带进去了。最后他说你生了呢不开腔，你说睡瞌睡！我说有个啥开腔的，已生了几天了。

我说：“下面疼的恼火的很，弄点开水叫我洗一下。”他把开水弄下，他说：“难怪你受不了，直接会了脓了嘛！”两个腿都没法往拢里夹，睡到那两个腿架起。后我老汉跟她妈说：“妈，她小便会了脓了，恼火的咋个家？”她说后面有皂角刺呢，你去给确些皂角刺，给她戳开就是了，唉呀戳了几下戳不开，弄了个细磁瓦子扎开。脓一放出来，直接疼的不得了，我哭了一晚上，说恼火的咋了？这再不想生了，这受不了啦。

第二天才听有个嫂子说，你到汉中南关李申大夫那去弄点药抹，不然那疼的！去人家给弄了点红身丹给上上，哎呀疼的！直接象用啥把这一转肉拿着揪的呀似的！到后半夜我实在支不住了，我说赶忙起来弄点开水洗一下洗掉，这么恼火！后洗了一下，还是疼，已经把药入到肉里了。可是上了二遍，都不疼了。（但）一直到过了满月，走路都有些困难。现在这长了一个麦杆子似的一个棱。²

流产、痛苦而漫长的生产、帮忙接生的人笨手笨脚、产后感染、冷漠的婆婆、好心却倒运的丈夫——这些加到一起使得安秀痛苦不堪。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她再未怀孕，但她后来收养了两个孩子。1954年，当她被选去参加接

² 与杨安秀的访谈记录，1997年。

生培训时，她下定决心要让其他人生孩子容易些。她离开年幼的儿子和一岁的养女好几个星期，去上培训的课程，回到村里后的第二天就成功地接生了第一个孩子。所以我接生，她们都说下（仔）细。因为是我亲身体会过的，很恼火。我说我自己吃苦不能叫你们受痛苦。（我）接过三辈人，原来这村的大多数人都都是我接的，除非有的到医院。³

杨安秀通过当接生员而成了国家接生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接生改革是中国农村妇女接触到新政府的最早事件之一。妇女卫生工作被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良好的接生技术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正如全国一条家喻户晓的口号所表明的：“怀一个，生一个，生一个，活一个。”⁴共产党和国家延续了之前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开始的一套语汇和政令，并决心在农村地区扩展更为广泛的势力。国家的政策执行者们设想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过程：他们将科学知识和实践带到农村，将产婆们赶走。他们认为这些产婆是造成众多婴儿和产妇死亡的罪魁祸首。⁵

国家有关当局在报纸上对这些产婆的无知进行斥责。接着，在肯定了国家资源和农村分娩的实际问题的局限之后，他们着手去重新培训和利用这些产婆，配备了像杨安秀这样新培训过的接生人员来补充他们在农村的势力。政府官员和接生婆的接触方式跟土改的对抗性的接触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国家有一些言辞尖锐的宣传，在实践当中，产婆并没有遭到讽刺打击或排挤。她们的技术得到全面的调查和汇报，她们还得到了强化训练并被当成重要的资源。一些解放前就接生的产婆甚至参与了培训解放后新一代接生员的工作。这种保持接生人员和接生习俗连续的做法展现的是适应能力和实用主义，它愿意吸收技术熟练的产婆、而不是谴责她们，愿意充分利用她们的技术，同时提高她们的服务质量。

从某些方面来讲，突出强调接生工具要消毒、产妇分娩时要躺着而不是坐着的新法接生运动，是新的党和国家早期一项成功的举措。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高达 300% 的死亡率下降到一半左右。⁶ 1959 年，接生员的数量从 15,700 名增加到 35,290 名。“助产士”、接受复训的产婆、以及参加短期接生培训的妇女的人数则更多，从 44,000 名增加到 774,983 名。⁷

³ 同上。

⁴ 克洛尔（Croll）1994 年：第 183 页。有关将妇女卫生作为国家首要任务的报道，见《群众日报》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2 版。

⁵ 这个时期的国家文件没有提及中国漫长的书写生育的传统。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将这一传统追溯到 12 世纪（1999 年：第 69-106 页，120-22 页，174-76 页）。有关生育的知识在 12 世纪的中国农村流传程度有多广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官方的文字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农村产婆掌握这种知识的信息。

⁶ 班尼斯特（Banister）1987 年：第 82-83 页。300% 的死亡率是来源于她对 1929 到 1931 年间的调查数字。她认为很多 50 年代中期农村的调查结果都过度乐观，并对其持怀疑态度。她估计的死亡率减半的情况也包括了城市地区。克洛尔（Croll）对 1949 年之前将婴儿死亡率放在 30% 至 53% 的地方调查作了概括。见克洛尔 1994 年：第 182-83 页。

⁷ 林巧稚 1959 年：第 387 页。第二组数据见诸福棠 1959 年：第 367 页。班尼斯特（Banister）1987 年：第 58 页。

尽管这些数字引人注目，但是国家没有对妇女的生殖健康投以持续的关心。决策者们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增加农业产出以发展工业化上面，将远远更多的资源放在了动员妇女劳动、而不是改变她们的生育生产状况上。分娩方式、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分娩方式变化并不显著，这可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是对农村妇女和农民的健康需求缺乏持久关注的一部分。新法接生方法直到 70 年代才在陕西普及，远远落后于 50 年代对促进合作化所做的努力。“大跃进”期间建立妇产院的尝试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大多数陕西的农村妇女都在家里分娩，由受过一丁点儿复训的产婆帮忙接生。生育上的革命比生产上的革命进行得慢的多。⁸

本章首先记录人们建国初期对旧式分娩和接生的理解，将党和国家试图使接生现代化的尝试放置到由国民党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改革议程的语境当中。此章既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农村的接生和实践，也描述对生育和农业所作出的虽短暂但却雄心勃勃的合作化尝试。这一章依据的资料是对接生员进行的访谈和分娩妇女所讲述的故事，两者都间接地对不断变化的家庭关系提供了评注。本章结尾探索围绕着分娩行为本身的层层交叠在一起的多重时间，其中，提供进步、科学、无菌的健康护理的时间同布满了鬼怪、且不时夹杂着产婆神秘死亡的分娩故事相互挤撞。运动的语言和时间并没有完全捕捉到农村分娩习俗的变化。革命范围的外部界限在分娩的领域远比在婚姻习俗的领域明显。

农村的接生方法和旧产婆

陕西农村有关身体的文化中，妇女的生殖功能被视为是不洁净且难以启齿的。年轻女孩常常为初次月经来潮感到惊讶。当时 13 岁，我外婆叫我去摘辣子，我去摘了回来晌午炒到吃了，晚上睡了一觉瞌睡起来，肚子疼得没法。我都叫我外婆，说：“我肚子疼得很。”她都歪我（批评我）说：“谁叫你晌午吃那么多辣子？吃多了，有火。”咋到天亮起来，看铺盖上糊的红的，不知是啥名堂，最后我都给我外婆说，外婆一看说：“砍脑壳的，你昨天晚上都来了月经了，看把这铺盖糊的脏的！”最后外婆才拆到洗铺盖吗。⁹只有在初次行经之后，她们的母亲（或婆婆）才会教她们将碎布放进护垫里，而做这些的时候必须躲着不让人看见。那还敢在门口晒！都是搭到后边人不去的地方，洗的裤子都不在人面前搭，都是搭到后院外些堆上。¹⁰大家都厌恶做这件差事。我们那小娃家，去洗时嫌脏，都偷偷家搭到沟里趟了，洗些，撻些。¹¹50 年代初妇联的报告称，很

⁸ 高小贤 2000 年：第 173 页；2006 年与陈春华的访谈记录。

⁹ 1997 年与王友娜的访谈记录。

¹⁰ 1996 年与曹竹香的访谈记录。60 年代该地区的妇女使用草纸当卫生巾，0.2 元钱一包。

¹¹ 1997 年与王友娜的访谈记录；亦见 1997 年与康汝清、1999 年与刘冬梅的访谈记录。

多农村妇女由于缺乏卫生知识，不但把碎布藏起来，还将之反复使用并从不清洗。¹²

人们对性事也同样缄口不提。少年夫妇通常要在结婚数年后才会圆房。曹竹香描述了自己婚前性知识的缺乏：结婚前我妈姐、不给我说。结婚时他 14 岁。男女之间的事，那都不懂，都多长时间了。咱也嫌怪（方言：不好意思）他也不懂。人不说，小伙子可在一搭给那（指丈夫）胡教呢！过去那人都老实，年龄也都轻，有个娃还嫌怪呢！没了（方言：要不）几年才有娃。¹³

在中医和礼仪的文字中，分娩本身被视作是一个不洁和危险的场合。¹⁴南郑县一句流行的谚语概括了这种危险：“儿奔生，娘奔死。”¹⁵难产的情况下，母子的生死便取决于当地产婆的技术。1950 年代政府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些产婆，这些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其接近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指产道太窄婴儿无法娩出，产婆用腿支撑产妇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用斧头砍绳，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这样似乎是为了以井口来象征产妇的阴门，井绳象征脐带。）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问产妇的长辈要孩子还是要母亲；如果要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¹⁶“饿老生”指一只手或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的时候胎儿就会伸手要盐）。¹⁷“西瓜生”是指胎儿生下来的时候仍包在浆包里，而产婆不懂得打开浆包，却把胎儿活埋。然而，有经验的产婆则会用手把浆包撕开，把婴儿拉出来。如果婴儿不啼哭，她会撕下一片糊窗户的纸，放在婴儿胸前焚烧以助其呼吸。¹⁸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有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上抹点油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如果婴儿的屁股先出来（莲花生），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如果羊水未破，婴儿的头就先顶出来一个包（顶包生），产婆会用手撕破让水流掉，然后用双手往下

¹² 妇联档案 178-106-038，1950 年；“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 年。

¹³ 1996 年与曹竹香的访谈记录。

¹⁴ 有关这种看法和做法的历史由来已久，在 1949 年之前和之后并无明显改变。费侠莉描述了宋代类似的对分娩的看法，见费侠莉 1999 年：第 110 页。

¹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南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4，1987 年 9 月：第 15 页。

¹⁶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 1950 年：第 3-4 页。“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中还描述了另外一个更让人毛骨悚然的难产事件。事件就发生在 T 村附近的南郑县城：待产时叫来老娘婆乱摸乱抓一阵，第二天又喊来一个娘婆，孩子摸不到。又请到三位老娘婆来帮忙。一个捉着右臂，一个捉着左臂，她丈夫按住腰。一个老娘婆拿着剃须刀由肚子剖到耻骨，结果胎儿仍未取出。当时产妇痛得将自己手指头咬断两个。即刻痛死。

¹⁷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 1950 年：第 4 页。

¹⁸ 同上。

推胎儿直到胎盘下地为止。¹⁹ 胎盘不能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²⁰

这些描述突出了有经验产婆的技术和知识，以及她们有时采取的残酷措施。1949 年以前的陕西农村，分娩时死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石翠玉的母亲和两个婶婶都于一百天内相继死于难产，造成了十三个孩子没有母亲的悲剧。后来，当她开始在 G 村学习接生时，明白了她其中一个婶婶是死于胎盘滞留。那就叫子宫粘连，娃生下来胎盘不能下来，胎盘粘连。到毕了完了以后可怜的把人吊到棚子上，把她吊到棚子上把头发这样绑住吊到顶棚上，老娘婆在底下处理胎盘，那个时候也不叫医生，那会儿医学也不发达，也不看。结果那把底下往下拉，硬把胎盘扯下来，那血，扯的跟烂，最后煞费苦心了，大出血死了。学新法接生那个时候，越学越想起我娘那时候可怜的，要是现在胎盘剥离不了，那人家就有办法。可怜的死去时丢下 5 个娃，给人的给人，没人管的很可怜。²¹

产妇和孩子面临的危险从完成分娩的那一刻到产后的第一个月一直存在。²² 让妇女在产后休息至少一个月曾是（现在依旧是）一种习俗，妇女的身体在生产完后被认为是不干净的。²³ 这段休息的时期被称为“坐月子”。这期间妇女要尽可能不下炕，更不要说离开屋子，也不能碰冷水或干活。地方风俗概要翔实地记录了要给产妇以及孩子准备的东西以及如何精心照料他们。年轻妇女分娩后的第三天，她的母亲会带着礼物来探望：鸡、糖、猪脚、蛋——这些在 T 村地区被称为“四喜礼”。人们认为产后的女人在坐月子的時候吃从娘家带来的东西吉利，因为据说这样能够增强新生儿同他母亲家的联系。²⁴ 鸡、鸡蛋、干馍、面饼、面条、熬好的红枣和核桃羹（有时还加上枇杷和红糖）是新妈妈偏爱的食物，²⁵ 这些食物能够优先为她们恢复身体和哺乳提供难得的营养。十到二十天之后，母亲娘家那边的人会带着一叠叠的被褥、衣裳和尿布来“看娃”——带来的这些东西婆婆也已有准备，然后便按照礼节一起吃饭。在 G 村，婆婆那边的亲戚也会带花馍来。花馍由干馍精心雕刻而成，制成花、蟹、凤凰、

¹⁹ 同上，第 5 页。

²⁰ 同上。“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和 1951 年的“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中还有此类赤裸裸的描写。宋代和清代的医学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对产婆的批判，见吴一立 2010 年。

²¹ 2001 年与石翠玉的访谈记录。

²² 关于清代产科著作中坐月子的概念，见费侠莉 1999 年：第 110 页。

²³ 高小贤 2000 年：第 173 页。一个妇女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每天清洗阴部以防止妇科疾病的重要性。她还评论说，产妇要在生完男孩 4 到 5 天后才能有性生活，生女儿则要两个月后才能有性生活。她说，因为男孩发育更快，其出生后产妇的子宫可以更快复原（1997 年与康汝清的访谈记录）。

²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南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4，1987 年 9 月：第 17 页。

²⁵ 1997 年与王友娜、2001 年与蒋秋娃、2004 年与欧阳秀的访谈记录。

鱼、猫和其他动物的样子，染上鲜艳的食用色素，并加上核桃、红枣和蛋做装饰。²⁶

然而，真正的“坐月子”却远没有这么喜气洋洋。婴儿常面临的一个威胁是“四六风”，婴儿破伤风或脐风的俗称。很多针对旧产婆的批评都集中在产婆用不卫生的手段剪脐带上，认为这会导致婴儿得四六风和产妇得产褥热。²⁷ 如果婴儿是夏天出生，产婆就用火把脐带烧断，因为人们相信夏天的时候婴儿肚子凉，所以用火烧可以防止将来肚痛。冬天的时候小孩的肚子热，就用剪刀在离肚子 8 寸左右的地方把脐带剪断。之后产婆把脐带里的血肉挤出来，把脐带打个结，然后将它穿过一层油纸，再盖一层棉花，最后用裹肚包好。²⁸ 如果剪刀没有消毒或者剪断的地方受到感染，婴儿在出生几天后就会得这种病（所以称“四六风”），其症状为啼哭、呕吐（“咏口”）、无法吃奶、抽搐。一些旧产婆说，婴儿得四六风是因为他们得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受到了惊吓或者生气，尤其是生闷气。²⁹ 产婆预防四六风的方法有几种：可以在婴儿的嘴上抹开口霰，用香烧婴儿的嘴和脸颊的两侧，在肚脐上抹万应锭和清心丸或口服，或者让婴儿口服用雄黄粉弄干的老鼠睾丸。³⁰ 1950 年礼泉县的一份卫生调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方法，产婆用一块碎陶片把出生才一天的婴儿的胸部皮肤划破，然后在一个铜钱上烧艾叶，再把铜钱放到婴儿眼睛、耳朵、嘴巴、鼻子的附近烧出豆大的水疱。³¹ 如果婴儿最终还是得了四六风的话，就有两种当地的治疗方法：一种是抓一只活鸽，撕掉胸部的皮，趁着热气放到婴儿脐带上；另一种是喂婴儿吃焙干的没长毛的老鼠。³²

政府报告把妇女产后的健康问题归咎于护理条件的恶劣。有些地区的妇女害怕流血，要一天一夜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不准睡觉；她们要直挺挺地坐在炕上。那叫你上到炕上，让你坐不让睡。底下缝一个灰包包。坐在那上边，一直坐一天两天，大概是血不多，才把那取了，裤子穿上，才倒下去，睡觉。就是那个过程，那就是难受的太。³³ 房间里没有新鲜空气。1949 年后的调查者发现，

²⁶ 只有坐完月子后，产妇才可以离开婆家去娘家（与乔引娣 [2001 年]、曹竹香 [1996 年]、王友娜 [1997 年]、欧阳秀 [2004 年]、袁茜 [2001 年] 的访谈）。花馍用剪刀、镊子、笔帽以及其他一些临时工具制作而成。史耀增详细描述了合阳县的坐月子习俗，G 村即在合阳县。见史 1999 年：第 177-80 页。张建忠列举了坐月子时的各种规矩和禁忌，并提到了这一习俗在不同地区的差异。见张建忠，《陕西民俗采风（关中）》2000 年之一：第 9-11 页。产后的一个月也是公婆和丈夫身份转换为祖父母和新父亲的时候。关中有些地区，新生儿满月的时候会举行热闹的庆祝活动，亲友会将新生儿祖父母家的锅底灰将新生儿的脸蛋抹黑以示庆贺。见张建忠 2000 年之一：第 34 页。陕南地区也有同样的习俗，不过做法不同：婴儿出生三天后，婴儿父亲的脸用锅底灰抹黑，象征着他从自由自在的青年到有责任心的父亲的转变。见周 1971 年。

²⁷ 关于对陕北产婆的批评，见秦燕、岳珑 1997 年：第 191-94 页。类似的批评亦见诸 1951 年妇联的一份调查，见“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 年。

²⁸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1950 年：第 5-6 页。

²⁹ 同上，第 7 页。

³⁰ 同上，第 6-7 页。

³¹ “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1950 年：第 29-34 页。

³²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1950 年：第 7 页。

³³ 与石翠玉的访谈记录，2001 年。

大多数妇女产后的最初几天只能喝到粥或菜汤，然后是面条或干馍片。她们不应该吃肉或蛋。山区的产妇只能吃到玉米，导致母亲和婴儿都很虚弱。³⁴

接生现代化

共产党和国家在宣传生育行为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时候，继承了国民党在南京时期（1927-1937）开始的一种努力，³⁵即培训产婆并要求她们进行登记注册。民国时期新接生员和旧产婆的差别很大。前者大多来自中上阶层家庭，多在城市接生，而后者主要在乡村接生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者。³⁶国民党的政策也表明，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旧产婆仍然很重要，但她们的接生方法却遭到了公共卫生专家的强烈批判。³⁷有人报道了福建产婆用牛粪敷脐带导致的悲惨后果；还有人“哀叹许多产婆没有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培训班毕业之后就马上回到老办法上去了”。³⁸1928年玛丽安·杨（Marion Yang）在一篇关于接生培训的文章里用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妇女坐在一个桶里，一个抬桶的男人站在她身边，而照片的说明令人毛骨悚然：“中国旧产婆（坐在桶里）。只能用双手和膝盖爬行。人们看到她从这个姿势直起身来，用衣襟擦擦手，没再做任何其他清洁，就把手指伸进了阴道。”³⁹旧产婆是常常被诋毁的对象，而现代医

³⁴ “陕西省1950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1950年：第29-34页；“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1950年；与石翠玉的访谈记录，2004年；妇联178-106-038，1950年。

³⁵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立了卫生部，并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接生员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或者类似训练，以便在政府登记注册。旧产婆要接受为期两个月的训练，还要登记注册（Yip 1995年：第58-59页；也见玛丽安·杨1928年：第774-75页；“Editorial: Midwifery Training in Peking”）。卫生部的全国助产士协会负责在北平和南京组织开办了助产士学校来培训接生员、复训旧产婆。1935年，包括政府代表在哪的卫生教育委员会建议扩大乡村助产士（叶嘉焯 [Yip] 1995年：第165-72页）。菲利普斯—约翰逊（[Phillips Johnson] 2006年）对中华民国在接生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卢卡斯（[Lucas] 1982年：第1-13页）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国家在医疗政策上的连贯性受到了跨国流传的医学现代化概念的深刻影响。关于接生在30年代国民党政府卫生计划中的地位，见卢卡斯1982年：第72-73、86页。

³⁶ 叶嘉焯（1995年：第167页）概括了江西南昌有关此情况的一项调查。费侠莉指出：“1930年，20世纪的公共卫生改革家玛丽安·杨（Marion Yang）估计大约有20万旧产婆需要复训”（杨1930年，引自费侠莉1999年：第298页，注68）。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杨估计需要复训的产婆数量为40万人（1928年：第774页）。关于玛丽安·杨，见杨念群2006年：第159页。

³⁷ 对产婆的敌视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早在明代（1368—1644），产婆就已经是医学著述中批判的对象（费侠莉1999年：第278、281页）。

³⁸ 叶嘉焯1995年：第10、167页。这里所提到的回到老办法上去的农村卫生专家是李廷安。

³⁹ 杨1928年：第768和769之间的插图。杨（第769页）引用的数字：中国产妇死亡率为15%，新生儿死亡率为250%到300%。叶嘉焯（1995年：第120页）提到国民党政府为复训旧产婆所作出的努力：“接生从未被看成是一项职业；年老的妇女之所以成为产婆是因为她们接生了很多孩子。于是，向现代妇产和保育的转变将意味着要摒弃旧的习俗和理念，接受现代的医学实践，逐渐改变对足月孕妇进行充分护理的意识，对所有新生儿提供预防和临床的护理措施。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学实践就是以这个对象的反面来界定自己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她们是人们唯一的资源。⁴⁰而且，正如李廷安在 1935 年的一份农村卫生研究里所指出的，大多数农民根本不相信新法接生。⁴¹就像许多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一样，关于助产士的规章制度也收效甚微，在农村尤甚。⁴²

1937 年日军的入侵和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到四川的转移并没有加大培训农村地区的新接生员的力度，随后的国共战争也同样没有。1948 年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全国只有 10,000 个得到持牌许可的接生员，而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城市地区。报告称大约有 80% 的接生是由旧产婆完成的，并把这一事实同 80% 的新生儿死于脐风的说法联系起来。⁴³陕西省卫生部的报告表明，在 1939 年到 1945 年期间，全省只有 24 位接生员正式进行了登记注册。报告称，在西安市以外的地区，每个县分配了一名新法接生员，“对于新法接生，势难深入农村。”⁴⁴

解放后不久，共产党和国家即开始努力复训旧产婆和培训新法接生员。

⁴⁵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待接生问题上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而是实践上

⁴⁰ 据叶嘉焯（1995 年：第 134 页）报道，1928 年，大约有 24 万接生员在接生，但截至 1929 年，“只有 385 名现代接生员在政府处作了登记”。登记的数字在 1936 年增至 3,174 人，1937 年增至 3,694 人（第 166 页）。

⁴¹ 李指出，尽管在定县有一个长期的农村卫生项目，该县 90.7% 的婴儿由旧产婆接生，10% 由接生员接生，0.3% 由自己接生。关于生育流行病的分类、产后感染的原因，以及训练有素的接生员的不足等问题，见该书第 65-68 页。曾在定县工作过的陈志潜（1989 年：第 1 页）也说到他的工作队在引进受过训练的接生员、复训旧产婆以及培训一个旧产婆的年轻亲戚时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包括：不相信新的接生技术和年轻的工作人员，不妥协让步，同行之间互相嫉妒。他总结道：“令人十分泄气的是，在急需合格的接生员这种紧急问题上步履维艰，但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可能轻易解决。要改变该地区人们的观念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⁴² 叶嘉焯 1995 年：第 59 页。关于 30 年代卫生局在北京市作出的督管和杜绝旧法接生的尝试，见杨念群 2006 年：第 150-59 页。关于 30 年代早期定县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情况，以及对“导致新生儿死亡的罪魁四六风”的讨论，见陈志潜 1989 年：第 72-99 页。1934 年，陕西成立了助产学校，每年招收 30 名年龄在 18 至 25 岁的未婚妇女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其中包括一年的实习期。这个助产学校对农村公共卫生实践的影响甚微。（秦燕、岳珑 1997 年：第 190 页）。

⁴³ 《中国儿童卫生福利议案》1948 年，文件 372.40，第 2 号档案。这份议案估计产妇死亡率为 15%。这份文件还包含了一份对 1943 年一年内四川成都 4,973 名新生儿的调查。在这些新生儿中，有 219 或 253 个新生儿的死亡是由旧法接生和其他接生方式导致的。这些死亡的婴儿当中，有 193 名死于四六风。四川的璧山区，两年内有 901 名新生儿，死亡率是 170%，死于四六风的婴儿占了死亡总数的 22%。

⁴⁴ 卫生部设立了一个目标：要为每个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县增加三名新法接生员，为少于 10 万人的县增加 2 名接生员。卫生部还提议复训旧产婆，并提到已有 630 名旧产婆接受了复训，但是还有更多的旧产婆需要复训（《陕西省卫生处工作报告》1946 年，文件 372.19，第 2 号档案：00019，00009）。同一份文件中的条目 372.82 里，还包括了山西和广东在 1948 年和 1949 年中各个产婆接生数的数据，但陕西省并没有保存此类数据。

⁴⁵ 有关妇女卫生工作改造旧产婆的需要的文献，见《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1985 年：第 165-66、356 页；另见秦燕、岳珑 1997 年：第 179-205 页。陕甘宁边区 1944 年 4 月开始的妇女卫生运动的简述，见《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1987 年：第 166-170 页。关于陕甘宁边区一名后来成为 1949 年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代

的：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要广泛和有效得多，相应地中共在农村的接生改革也影响了更多的人。⁴⁶

例如，1950年6月，在两名助产士的陪同下，年轻的妇联工作者们来到了西安以南的长安县西韦曲村。⁴⁷她们此行的目的是调查农村的妇婴工作——这一举动如此之早令人吃惊，甚至比土地改革开始得还要早。⁴⁸她们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当时村民们正忙着麦收和筑坝，大多数妇女都在田里劳动，无法开会。由于调查人员询问孩子和给他们接生的情况，有的村民担心她们是来抓孩子或惩罚产婆的。面对充满困惑和疑虑的沉默，工作组不得不将工作从西韦曲转移到东韦曲，正好有一个当地的妇女主任在那里。在她的陪同和许可下，她们走访了各个生产队队长（每个都是男性）的家，向他们的妻子和姑嫂解释调查的目的。通过这种方法，她们找到了6个产婆并对其一一走访。⁴⁹

最初产婆们害怕政府会禁止她们接生，但当工作组向她们解释说是向她们学习接生的时候，她们才慢慢地放松了。这些产婆详细全面地描述了处理各种难产的方法以及防治四六风的方法。其中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生动地表现了生育的危险和农村医疗设施的匮乏，比如在生产过程中当胎儿威胁母亲生命时如何将之肢解。还有一些是没有进行消毒的结果，比如四六风的普遍性，死于四六风的婴儿将近占了婴儿死亡总数的一半。⁵⁰在东韦曲村，新生儿死亡率为38%（195个婴儿死亡），与中国其他地方农村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大体接近。⁵¹

表的新法接生员的事迹，见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传教育部 1949年：第137-41页。

⁴⁶ 安炳日（Byungil Ahn 2005年）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接改革接生上所做的尝试进行了具有洞见的比较。

⁴⁷ 这份文件没有标明日期，陕西省档案馆将之与其他1950年的文件放在一起：《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妇联档案178-106-002（1950年？）》。1950年4月、5月的新闻报道可以证实调查妇女健康的迫切需要，见《群众日报》1950年6月27日，第2版。

⁴⁸ 1950年6月全国宣布土改。新生国家政权的初步巩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项卫生工作这么早就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任务，这实在令人惊讶。位于长安县东北的渭南专区直到1950年10月才开始大规模的土改（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1993年：第7-8页）。然而，渭南县第一届妇女大会已于1950年5月召开，并成立了县妇联（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第491页）。如果长安县也依照类似的进度，如果调查人员来自妇联，那么对妇婴卫生和生育行为所作的调查就是这一新组织采取的首次行动之一。

⁴⁹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1950年：第1-2、9页。

⁵⁰ 费侠莉（1999年：第177页）指出，在唐宋的文字中，帮助接生的产婆是用牙齿咬断脐带，而不是用刀切段或用剪刀剪断。用牙齿咬的方法很可能对预防四六风有效。东韦曲村的产婆回忆，接生的522个新生儿中有84个死于四六风——占报道的婴儿死亡人数的43%（《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1950年：第8页）。一个月前，在宝鸡、蓝田和西安周边农村进行调查的三个工作组发现，新生儿中有50%（具体人数不清楚）是死于四六风，很多死于生产的妇女是死于大出血或产褥热（《群众日报》1950年6月27日，第2页）。

⁵¹ 该村出生的522个孩子中有62%活了下来，死亡婴儿中84个（43%）死于四六风，111个死于其他未具体说明的原因。并不清楚这522个婴儿是在多长时间内出生的，其中278个男孩和243个女孩是平产，还有一个男孩是难产。参见“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妇联档案178-106-002，1950年。同期的一份省级报告指出，该村出生的522个婴儿中514个用旧法接生，其中314个死亡。这一巨大差异说明这类报告中存在着统计失实的问题。参见“陕西省1950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1950年：第29-34页。

两条陕西的谚语地概括了这一形势：“只见婚嫁妇，不见生儿女”；“只见娘怀儿，不见而走路”。⁵²

早期的官方报告除了生动地描述了难产的危险、接生过程不消毒和贫困状况以外，还详细记录了许多产婆的接生技巧。关于华阴县一个村子的报告里提到了产婆郝陈氏。她当时已经 70 岁，接生了 40 多年，她处理难产的技巧在周围几县家喻户晓。她都是用回转法和头颅穿刺法。该报告总结道，“但唯一缺点不知消毒，故妇婴常有致病之危险”。⁵³

在东韦曲村，调查人员发现，该村出生的 522 个婴儿中只有 8 个不是用旧法接生。⁵⁴ 在 3 名接受“新法接生”的妇女中一人是新法接生员的姐姐。⁵⁵ 另外两个人从当地妇女代表那儿知道了新法接生，⁵⁶ 而且她们的婆婆又太老了，没法接生。这份报告称，这 8 个孩子全部都健康地活了下来，所以村民们都夸新法好，但他们又对之持怀疑态度。

早在 1950 年中，卫生部召开全国妇婴卫生工作者大会的时候，妇联就把改革旧产婆作为首要任务，开展了一场消灭产褥热和四六风的运动。⁵⁷ 全国很多宣传文字都把生育写成是一个政治问题，将旧法接生说成是“生育妇女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封建桎梏，并且大多数人将即将临盆的妇女看成是可耻、肮脏和罪恶的”。⁵⁸ 国家出版的《新中国妇女》上的文章延续了国民党对旧产婆的批判，把农村的接生方法说成“封建、迷信、落后”，把旧产婆描绘成“封建思想、自以为是，而且无心学习”。⁵⁹ 一个 1950 年在上海出版的、名为“养娃

1928 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大约为 250%，许多死于四六风。玛丽安·杨 1928 年：第 769 页。叶嘉焯（1995 年：第 10 页）也引用了此数据。中央妇婴卫生小组的一份调查估计在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每年有 83 万多个婴儿出生，死亡率为 285%，大约为 23.8 万个（《群众日报》1951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在全国范围内，1952 年，卫生部妇婴卫生小组组长估计，每年有 1700 万妇女生育，产妇死亡率为 15%，一半是死于产褥热。新生儿死亡率为 20%，其中三分之一是死于四六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2 年：第 29-30 页）。

⁵² 《群众日报》1951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

⁵³ “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 1950 年：第 29-34 页。

⁵⁴ 这份调查在提及该村最近出生的婴儿数时有出入，一说 521，一说 522。在这些新生儿中，有 8 例是新法接生（6 个是同一个母亲生产，另外两个由两个不同的妇女生产；“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 1950 年）。

⁵⁵ 这个新法接生员似乎在 1949 共产党到来之前就受过训练，因为她在 1950 年之前就已经为她姐姐接生过 6 个孩子。

⁵⁶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 1950 年：第 2 页。

⁵⁷ 妇联 178-106-038，1950 年；林巧稚 1959 年：第 375 页。

⁵⁸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2 年：第 29 页。

⁵⁹ 葛以嘉（Goldstein） 1998 年：第 163，162 页。《新中国妇女》1952 年 10 月，第 26 页和 1953 年 6 月，第 24-25 页有语气不那么敌对的文章，在提到复训产婆时尤为如此。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指出，培训新法接生员的运动是党和国家“使妇女的生育行为与地方关系网络和机构想脱离，在新的国家系统中对其进行重构”。他说，通过将封建与科学对立起来，“产前保健工作者们被动员去废除”之前存在的做法（1998 年：第 154、156 页）。蒂利亚·达文（[Delia Davin] 1975 年：第 257 页）对旧产婆的评价稍微积极一些。她认为，国家提供了科学，而旧产婆却付出了辛勤的基层劳动：“许多‘学员’是农村产婆，尽管她们未洗的双手和长指甲感染了数不清的产妇，但她们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一旦她们的经验跟一点理论知识相结合，她们就能

娃”的短篇故事将医术出神入化的现代医生同双手肮脏、头脑昏聩的产婆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这个短篇围绕的是一个名叫凤莲的女人的故事。凤莲失去了两个孩子，一个流产了，另一个死于四六风。凤莲的婆婆确信凤莲无法生出健康的孩子，家庭关系日益恶化。当凤莲快要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婆婆去请村里的产婆。这个产婆（不可思议地）认为需要用脏污的双手去接生一个皮肤光洁的健康婴儿。她迫使凤莲跑动并做体操以便加速生产。当凤莲倒下的时候，产婆试图说服婆婆说凤莲反正要死了，不如剖开她的肚子救孩子。幸好凤莲的丈夫问了村支书，村支书让他们请一个女医生过来。医生给凤莲注射了（未具体说明是什么，但明显是科学的）两针后，坐下来吃了饭，训斥了产婆，并给她讲用更卫生的方法接生的重要性。当医生和这家人在隔壁房间讨论卫生的时候，凤莲醒了，并在没有医疗辅助的情况下诞下了一个健康的婴儿，虽然医生在婴儿啼哭的时候进了房间并用消了毒的方法剪断了脐带。故事说从那以后产婆接生的时候脸和手都更干净了，但是并没有说对她进行过复训。⁶⁰

这类言辞尖锐的宣传文字对旧产婆进行了批判和嘲弄，将她们说成是封建主义的化身，这种做法事实上截然不同于政府在实践中对产婆的处理方法。农村的蹲点干部更可能去培训产婆而不是将她们作为攻击的目标。卫生部和妇联协调全国复训产婆的工作。⁶¹ 1951年，西北地区指导妇女卫生工作的口号是：“推广新法接生，改造旧产婆，训练新法接生员。”⁶² 11月，陕西省妇联宣布要跟公共卫生部门在年底前对3300名旧产婆进行复训。⁶³ 他们计划先召开群众会议，然后再用这些方法进行宣传：图解、快板书、街头剧、散发传单以及墙报和黑板报。⁶⁴ 他们会“说到旧法接生及四六风或产褥热致死的典型事例，说明旧法接生的危害性，解释新法接生的好处”，并“用各种卫生以及怎样用新法接生等挂图，如有关接生机器、产前检查、临产时的准备工作（如何消毒）、畸形胎儿等陈设。”妇联的报告指出，要引起群众注意，关键是要用当地人们熟悉的典型事例：“例如，卫生院用该县接生的旧产婆给产妇剖腹取娃，结果大人孩子都死了。用这些事实来宣传，群众爱听，也易于接受。”⁶⁵

成为能干的医疗工作者。”亦见达文（1976年：第131-32页）。然而，科学起主导作用；无知的产婆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否则她们就对妇女的健康构成威胁。

⁶⁰ 刘彦洲（音译）1950年。

⁶¹ 葛以嘉 1998年：第153页。有关卫生部发起的更大规模的培训妇婴卫生工作人员的运动，见《人民日报》1951年2月3日和1951年11月5日。据后一篇文章报道，全国建立了9,464个接生站。

⁶² 《群众日报》1951年12月1日，第3页。

⁶³ 除非另有说明，这一段中的所有信息皆引自“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这个目标适度且切合实际；到1951年11月，据报道，陕西所在的西北地区已有2,045名旧产婆完成了复训，尽管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数字要大得多（《人民日报》1951年11月5日）。

⁶⁴ 据说，关中和陕南地区到县里去参观这些妇女卫生的公开展览的访客高达几千人。在一项全国的指令中，康克清也提到了通过庙会 and 家访的方式对妇女进行教育（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2年：第2页）。《卫生宣传工作》1951年8月25日，第63-65页刊登了有关孕期健康和卫生的图片给农村的观众看，还配上了琅琅上口的操作指南。第73, 75页还刊登了关于生孩子的快板书，以及“卫生歌”的曲谱和歌词。在此我要感谢 Miriam Gross 告诉我这些信息。《西北妇女画报》1953年5月1日刊登了关于新法接生好处的漫画。

⁶⁵ “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

在公开讨论生育问题的过程中，宣传工作人员利用公开演说来讨论那些通常没有谈到的问题。一本面向接生员的技术手册说道，由于封建迷信，即使是明显怀孕的妇女自己也不能直接说生孩子的事，只能委婉含蓄地说。在一次由一百多名妇女参加的卫生公开会上，当谈到生孩子的问题时，除了那些由于太害羞而不好意思走的妇女，其他妇女都满脸通红地笑着离开了。再召开第二次会议时，没有一个人来。有人将这种情况与共产党的经济计划进行比较，并说：“我们知道这个妇婴卫生运动社非常的难，比减租减息还难好几倍。”⁶⁶

复训产婆本身是带有实用和安抚性质的。当地干部都非常小心地不要把旧产婆当成政治敌人来对待。在为期三周的调查工作中，一个工作组教 10 名产婆学习用开水洗手，消毒剪刀。新闻报道称，“经验之一是对待旧产婆的态度，应是团结、教育、逐渐改造她们，不能嘲笑、讽刺、打击”。⁶⁷ 干部们报道了 1951 年的一次复训产婆课的情形：

她们初来 [学习] 时思想有顾虑，表现不安心。个别地方有坏人造谣说，学习是为了清算斗争她们过去接生死了的“陈年账”。有的怕嫌羞，有的担心孩子、操心家务活。妇联干部针对着她们这些顾虑，予以思想教育、揭破谣言，给她们讲妇女不懂卫生常识及旧法接生的坏处，娃娃得四六风、妈妈得月子病（产褥热）得原因及造成死亡得恶果。用实际的例子、小组讨论等方式来稳定她们的情绪。⁶⁸

典型的复训产婆的故事都强调尊重她们的重要性，利用她们在土地改革时建立起来的对政府的好感，不断地鼓励她们接受复训。⁶⁹

政治和情绪问题解决了以后，陕西复训产婆的教员们开始转向接生具体步骤的问题。山东省政府一本小册子详细地列出了为期十天的复训旧产婆的课程，内容包括：“孩子是怎样来的”（包括女子生殖器生理解剖介绍），孕期注意事项，新法接生的好处，产前准备，怎样接生，发生难产怎么办，怎样坐月子，小儿传染病预防和种痘技术，怎样宣传新法接生，以及怎样作工作报告等。⁷⁰ 附录中的“接生员守则”分为“六要”、“六不许”。“六要”是：要让产妇躺着生孩子；要剪了指甲再洗手，用肥皂洗后再用酒精擦；剪子要用开水煮；要是见到孩子不喘气，要施行急救法；孩子生下后要滴眼药；要实行种痘。“六不许”是：不许坐土炕，卷炕席，蹲着、站着、坐着生孩子；不许用秫秸杆、瓦碴片、牙齿咬来断脐带；不许用脏脸盆洗孩子；不许乱拉脐带及胎衣；不许伸手入阴道及戳破阴门；遇到难产不许乱动手。⁷¹ 陕西的复训课程里还有实践环节，在这个环节里新法接生员教旧产婆如何进行产前检查，如何在接生前消毒器械，以及如何在新儿不能喘气时施行急救法。报道还提供了一些旧产婆对自己之前的接生方法进行反思的救赎性场景：安塞县的刘静说，“过去娃没下来先楼死，把娃压死了。”石秀英说，“我过去接生娃娃，十个

⁶⁶ 王德一 1949 年：第 1 页。我们在访谈中很少遇到不好意思谈论生孩子问题的情形，但如果我们在她们年轻的时候问及有关生孩子的事情，她们会如何回答就不得而知。

⁶⁷ 《群众日报》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2 日。

⁶⁸ “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 年。

⁶⁹ 例如，见陕西省妇联福利部 1954 年：第 3-7 页。

⁷⁰ 鲁霞 1951 年：第 8 页。

⁷¹ 同上，第 18-19 页。《卫生宣传工作》1951 年 8 月 25 日，第 66-69 页刊登了一篇带图画的讲述新法接生好处的文章，图文并茂地解释了许多注意事项。

里只活三四个。这都是抓着啥用啥，开脐带不消毒的。”她们保证以后一定要按科学方法去做，专心为劳动妇女及下一代创造幸福。⁷²完成了复训的旧产婆被派去帮新法接生员接生，组织成学习小组，每一周见一次、并且每月都要同卫生工作者和妇联的干部保持联络。⁷³

一份 1954 年的一本小册子在讨论改造产婆时超越了救赎的议题，其叙述方式与有关劳模事迹的叙述定式如出一辙。这个小册子描述了有个接生员在庙会上宣扬接生新法，对邻居的嘲讽不屑一顾。因为她拖着裸体妇女的图片到处走，邻居骂她辱没了祖宗。虽然缠足行动不便，这个模范接生员顶着暴风雨，爬过小山沟，翻到山对面去给人接生。当她在 1953 年 1 月西北地区卫生工作劳模大会上领奖的时候，她说：“我高兴得流出眼泪，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哪有今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光荣。”⁷⁴女劳模在党的领导下力排众议和艰难为集体积极工作的主旋律掩盖了接生的具体细节。早期关于接生的报告里那些生动形象的细节都不见了。

整个 50 年代初期，国家为接生工作制定的计划依然十分宏伟，并表明一场彻底的改革农村接生方法的运动迫在眉睫。据报道，1951 年 8 月，全国有十万名旧产婆在接受复训，有一万多个地方建立了接生站。中共为卫生部制定的一份计划宣布了到 1952 年每五个村要有一个卫生站的目标。⁷⁵1953 年，妇联宣布六月为“妇婴卫生运动月”。⁷⁶国家政策制定者们设想，通过将社会主义计划和运动时间的政令结合到一起，便可像重塑农业一样，也对接生工作进行重塑。

农村的接生方法

经验丰富并在解放后受了点训练的旧产婆依旧在农村生育改革计划中起关键作用。她们当中技艺最娴熟的通常都是跟着自己母亲学的。B 村的产婆吴淑贤因为手艺精湛和接生过 12 个孩子，所以很有名望。如其他旧产婆一样，她更倾向于让产妇蹲着生产，她自己用力推产妇。她知道用金子熬水给孕妇喝以防早产，也知道如何对剪刀进行消毒。解放后她接生的收费不高：一条毛巾、一方手帕、

⁷² “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 年。《卫生宣传工作》1951 年 8 月 25 日，第 57 页刊登了一个全国闻名的来自平原省（后划入河南和山东）的模范第四代旧产婆的故事。这个旧产婆在 1949 年经历了一周时间的复训，学习了有关四六风的知识，变成了一个新法接生的坚定拥护者并训练其他产婆。

⁷³ 与政府人员的实际联络情况怎样、复训到底有多彻底等问题很难从这些早期工作报告里热情洋溢的计划中得到肯定答案。例如，见“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 年。

⁷⁴ 陕西省妇联福利部 1954 年：第 1-3 页。

⁷⁵ 妇联让其各地方支部计算每个村旧产婆的数目，并算出一共需要多少培训课才能安顿这些旧产婆；与此同时，妇联还增加了一些新法接生员以满足地方需要（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2 年：第 1、12-13 页）。康克清在报告中给出的有 100,000 名旧产婆这个数目比卫生部在 1951 年 11 月提供的 91,224 要高一些（《人民日报》1951 年 11 月 5 日）。

⁷⁶ 妇联 178-122-012 1953 年。

或一双鞋子。⁷⁷ 50 年代的时候，她在乡里上过培训班，还学会了一首接生歌，歌词总结了新法接生的主要步骤。由于她技艺精湛并且全身心地投入接生，她在当地享有声誉。她的儿媳回忆，有时下大雪，下大雨，拄个棍，身上披个啥就走了。有坐胎。就那我妈把那都接下来了。我妈给人家接生都没有伤亡。有时医生给一接，也下不来，就叫我妈来了。我妈就把那取下来。⁷⁸ 吴淑贤直接生到 70 年代，几十年的接生生涯中一共接生了一百多个婴儿。⁷⁹

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希望，完整受过科学现代的接生训练的接生员最终能够取代旧产婆。新法接生员为新中国而工作，意味着要体现并将现代性带的好处给农村妇女。⁸⁰ 然而新法接生员接受的训练可能很短暂。本章一开始提到的有痛苦生产经历的杨安秀在 1954 年完成了一个两周的培训课程。学到紧张的没法，我就看到人家都识字吗，写里了，我又不会写，确实话，就头搁脑的（缩头缩脑），这咋得了啦？最后跟到人家实习时，做了个娃娃胎盘呀齐的，咋接？弄了个人睡到案子上，把娃娃放到肚子上，说咋样接，咋样消毒。安秀学会了怎么处理臀位产、横位产和其他难产的情况。⁸¹ 学了说跟到一个老师去实习接，接了两个，思想上还是有点害怕，我想，这么大一回事呢，叫我去我敢吧？安秀第一次接生遇到的是臀位产的情况。头天去学了，第二天连着接了两个“立生子”，我想学了倒好，如果不去学，这两个“立生子”咋处理？（原来）都不知道处理法，可老师给讲了下来了咋处理，下来了口里给呼吸气，“立生子”大都是腿先下来，不叫唤，可是你把口里给他掏了，羊沫给吸了，嘴里呼吸气，可以缓过来。安秀在接生的头几年每年都会去接受进一步的培训，每年两次，每次一个星期。⁸² 后来的“大跃进”时期，合作社在每个月的十五都会为接生员举行学习小组。⁸³ 安秀成功地接生了四十年，处理了许多“立生子”的难产情况。产妇们感戴她的恩德，纷纷要求她做孩子的干娘，然而她拒绝了这些请求，因为这样一来，她的干儿子干女儿就太多了。

如果刚接受过培训的接生员们遇到了异常的难产情况，她们被教导要立即将产妇送到医院。⁸⁴ 然而，安秀告诉我们，一直到了生育改革时期，即使在极为难产的情况下，产妇都会要求她为她们在家接生。她说，“到医院里去，不

⁷⁷ 她父亲曾提倡支持天足，她侄子的妻子说她脚太大，跟男人的脚一样（与王西芹的访谈，1996、2006 年）。

⁷⁸ 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 年。

⁷⁹ 与王西芹（1996 年）、庄小霞（1996 年）的访谈。

⁸⁰ 卫生部宣传了山东一则模范事迹，见《卫生宣传工作》第 3 卷，11 期（1952 年）：第 230-31 页。

⁸¹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 年。

⁸² 同上。有关进一步培训，亦见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 年。

⁸³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 年。

⁸⁴ 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 年。

象我们这真正把她经管到，象哪里不舒服啦，给摸呀，象这热天里给扇扇子呀，读读闲呀，擦擦汗呀，医院里把你 bie 到（放到）床上不啃劲儿，有计划的嘛，到时间才出面去。她说我们不如到屋里生，花那么多的钱。”⁸⁵

有些新法接生员完成了更完整的长达一年的培训课程，包括三个月的实习训练。⁸⁶ 她们学习的科目包括产科和妇科、内科、外科、儿科，还学习臀位产和横位产以及如何教产妇下蹲使胎儿翻转。她们学习有关葡萄胎妊娠的症状和其他病症。石翠玉是 G 村的一位接生员。1958 年，她同来自合阳县各地的学员一起上接生培训课，每个学员都是由各自的生产队派来的。实习从县医院开始，偶尔也在公社管理的卫生站进行。然而，即使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接生员的第一次接生还是让人神经紧张：老师叫学生轮流一个一个实习，去第一个实习的老师让我接，是平产，小孩下来，要保护会阴，学习的理论要和实践结合理，一手按，一手这样保护会阴，娃下来，手下去觉得热乎首的，软溜溜的，把我吓的手软的，心跳的，老师赶紧把我手捉住，老师悄悄给我说，不要害怕，就是这样，唉呀，还是害怕的，出了一身水，头上的水往下滴。头到第二个，仍害怕，以后慢慢就强了点。回到村里，头回来把 5、6 个都接了，根本不紧张。⁸⁷ 翠玉回到村里后，村里旧产婆的接生生涯便开始终结了。但当时二十多岁的她还是尊敬地称呼这些旧产婆“婶婶”或“妈妈”，并经常叫她们协助她接生。

⁸⁵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 年。这种在改革时期不愿去医院的情况使杨安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经常被产妇的家属施压，说她要为极其危险的接生负责。高小贤 2002 年：第 62 页提到了山区的妇女不愿去医院生孩子，以及妇女若要去医院生孩子，除过自家人外一般没人愿意抬等问题。一个反复出现在有关产婆的故事里的一个主题是：产婆在医院帮忙接生，而受过训练的接生人员却手足无措。谈起生育改革的时候，董桂枝说，土改后，有难产这都去医院去了。医院就叫我去。有一次来了个难产的，没人能接生，就去县里叫医生了，屈桂月的媳子叫进去。一看，子宫都下来了，我给推了回去，伸手进去把娃拉了出来。马丽（1999 年访谈）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她自己去医院看病，当时正遇上医院正有一个妇女难产：我那一年得病住到医院里，医院来了个难产，一个小伙子，一个女子说不来，就给妇女压一压，这都是这，这好像是软的，我说娃先从屁股生下来，这都是硬的，你摸着软的是娃的屁股门子，那医生说：“你知道啥”。娃生下就是那样下来了，人家说：“那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我就笑哩，我说那都是我学过的嘛，看把你为难的，这儿压那儿压。

⁸⁶ 关于面向产婆的样本教科书，王德一 1949 年。此书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女子解剖，孕期的各个阶段，不同阶段小产的症状，正常分娩，正常分娩和难产的接生技巧，如何坐月子。这本书面向的读者可能是农村产婆；比如，第 14 页写道，当婴儿露顶时，产婆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放在阴道口两边，“食指和拇指之间要离阴道口有两韭菜叶那么远。”顾希明 1951 年：第 63-75 页列举了有关怀孕、接生、产后护理的指导说明，这些说明更简洁，并且明显是面向农村的卫生保健工作者的。

⁸⁷ 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 年。

但当她开始正式成为接生员后，据她估计，村里 95% 的接生都不再由旧产婆完成了。⁸⁸

除了强调洗手和消毒，50 年代中国的新法接生还强调最好产前检查，⁸⁹ 让产妇躺下生产，帮产妇娩出脐带和胎盘而不是生拉硬拽导致大出血。要彻底帮新生儿清洗以去胎脂，而不是只用脏棉花擦干净婴儿的嘴巴。房间要保持新鲜空气流通，应该给产妇较软和热的食物吃，比如蛋类。⁹⁰ 以上各项都被拿来同旧法接生相比较。⁹¹ 马丽在 1949 年后受训成为接生员，她回忆说，用旧法接生的人，不敢拾婴儿，把婴儿撂到地上，等 ni 包子下来，胎盘下来，这才敢拾娃。现在是把娃先拾的搁下，用钳子把大人的胎盘系系剪住。⁹² 除了消毒之外，最主要的变化是让产妇躺着而不是坐着或蹲着。何改珍解放前解放后都生过小孩，她说躺着接生对产妇好：那旧社会接生人家说，叫人坐地上，害怕把炕弄脏了，坐下人发晕，说是血迷心，眼看着鲜血流呀流几盆。那是旧社会坐地下，眼看着鲜血发晕，呀，到底是睡下来舒服呀，我生我这个娃子，人家叫我睡下，一会儿就生下了，人家那浑身都不痛。⁹³

并不是所有的产妇都喜欢新法接生，石翠玉回村后接生的第一个产妇就是例子。她不睡，难受的，我就硬要让她睡。那你睡下，平平的，屁股抬高，厉害的那血多了。唉，“你这还是这样的新法接生，唉，你叫我起来，难过的。”我说，“不能起来，你不流了。”……我会你说新法接生跟老法接生就是不一样，那老法接生不知道多少妇女害了妇科病或子宫下垂，农村叫囊。我记得两个人得了那个病，我一天给送药或放药。那老人就走不了，那厉害了就像茄子那么大，妇女吗可怜的，那就是生娃弄下的病。⁹⁴

⁸⁸ 同上。

⁸⁹ 高小贤（2000 年：第 172 页）指出，80 年代以前，陕西农村的妇女基本没有人做过产前检查。

⁹⁰ 与石翠玉的访谈，2004 年。

⁹¹ 秦燕、岳珑 1997 年：第 191-94 页引述了陕北的生育习惯，对新旧法接生的比较作了概述。1951 年的一份陕西调查显示，妇女生孩子没有固定的地点，要么蹲在茅房，要么蹲在牲口棚，要么蹲在墙角（“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 年）。据 50 年代在妇联工作的李秀娃（1996 年访谈）报告，妇联干部编了几句诗用来对大众进行教育，其中一句是“生娃躺下流血少，大人小孩身体好”。

⁹² 与马丽的访谈，1999 年。

⁹³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 年。1954 年的一本关于模范接生员故事的小册子持相反的看法，说按照旧式的接生方法，躺下接生会导致血淹心（陕西省妇联福利部，1954 年：第 5、10 页）。亦见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传部 1949 年：第 137-40 页。认为躺下来是最现代的妇女分娩姿势这一执着的信念跟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分娩观念类似。美国 70、80 年代的生产运动挑战医生的权威并使接生工作得以普及。这项运动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妇女应该多走动并蹲下，如此一来重力的作用有助于她们生产。

⁹⁴ 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 年。班尼斯特（1987 年：第 67 页）说，像子宫脱垂和阴道感染这样的妇科疾病在 70 年代被赤脚女医生们大规模地解决了。

新法接生在中国农村的传播是不均衡的。了解新法接生不一定就意味着妇女会在后来生产的时候继续使用它。一份 1953 年的报告估计，全国农村只有 5%到 10%的妇女使用新法接生方法，报告还提到，有些接生员又用回了老方法。⁹⁵ 康杏芬从 1963 年到 1973 年生了 5 个孩子，第一个是在 Z 村的卫生站接生的，其他的 4 个（其中包括一个“立生子”）孩子都是在她丈夫的帮助下在家接生的。她对新法接生的了解并没有改变她自己对消毒的态度：

高小贤：你生娃，剪脐带，你知道不，用啥剪的？

康杏芬：剪子么。

高小贤：那时剪子消毒不？

康杏芬：还消毒咧，消个屁，一剪，就一挽。

高小贤：娃脐带上啥也不包？

康杏芬：不包。⁹⁶

就连受过接生员训练的马丽，也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第二个孩子死于四六风。那快的太太，在我妈那里，到晚上，我试着不舒服，我让她给我把火打上，水还没烧开，这娃就要快生了，生了后一看是个娃子，我弟就把那娃拾起来包了包，我给他说的，你把娃拾起来包一包就行，只是剪刀没有消毒。我学过接生。我说身上一点都没有消毒，他说：“唉呀，旧社会多少都没消毒，怕啥。”⁹⁷ 直到“大跃进”以后新法接生才变得更常见，妇女才开始叫新法接生员为她们接生，但接生的地方大多仍是家里。⁹⁸ 一直到 70 年代，新生儿死于四六风的情况依然很普遍。⁹⁹

接生员的工作时长本来就无法预测，有时持续一整夜。¹⁰⁰ 无论接生员的技术有多么娴熟，接生都是辛苦又费神的工作。石翠玉说，你看那实习哩，那还不熟悉，越接越熟。医学和干行政的不一样，那是越干越难咧！人常说，三年学个好医生，十年学个好医生，十年学个没医生。为啥哩！越学越难咧。碰的这样那样越多，或是难产的，我记的我回来反碰了。记不得啥时候，不知是 59 年底，还是 60 年，碰到一个葡萄胎，把我吓哑咧，这就是难产，葡萄胎就没娃。还碰到一个那就没娃，软溜溜的这大，浆水一破流了些水，掉下来都是

⁹⁵ 《新中国妇女》1953 年 6 月，第 6 页，引自葛以嘉 1998 年：第 166 页。

⁹⁶ 与康杏芬的访谈，1999 年。

⁹⁷ 与马丽的访谈，1999 年。

⁹⁸ 与马丽（1999 年）、石翠玉（2004 年）、李秀兰（1997 年）的访谈。

⁹⁹ 与李秀梅（1999 年）、康汝清（1997 年）的访谈。

¹⁰⁰ 这种情形可能会使家务劳动的分配比一般的农耕家庭更为公平。在杨安秀（1997 年访谈）家，她丈夫承担了做饭、洗衣和照顾孩子的工作，至少在她去接生时是这样的。

白蔓蔓，把那一流完，把人吓的，没啥，把人吓的。这以后再没见过这样的。

101

尽管如此，石翠玉也和杨安秀一样，很清楚接生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一个好接生员，你的性格你就一心一意的为婴儿、产妇要耐心对待，不能生疏老倔，你不嫌脏，不嫌累，那会儿说，有肮脏的思想，没肮脏的工作。那就说起来你接生就是连屎和尿都血打搅哩，你怎能嫌那个，是不是？老师就给你讲得清，你上课就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你嫌脏嫌累你就学不下一个好接生员，好助产士。

因为接生和村里其它妇女关系更近的，咱就说近些，就刚才那个，我刚才叫得来，不是先到那边他那个屋里，那个屋里那个做饭的妇女，全是我接下的，刚到那里说笑哩，我爱说笑和那些人都熟，我说这些全是我的娃，思想就不一样了，思想就开朗了，那就啥也不怕，该说的就说了，该啥就咋哩，来说有些妇女来说，有些妇女就说他那吊在嘴上，不是开会还要给人讲哩，那接生的好处是啥，就在男的跟前，随便在谁跟前……那个工作，是不是。你没有娃娃那咋，妇女是半边天哩，你还耻笑这生娃的，接生的，就没有这个社会哩。

102

随着接生技术的规范化，产妇的死亡率开始逐渐降低。曹竹香那一代人的境况同解放前境况的对比是极度鲜明的：和解放前比较，最大的变化，就是妇女生娃的痛苦，死亡的，伤情的还没有。¹⁰³对于那些晚十几年出生的妇女来说，产妇死亡的事例是她们接受到的关于过去的知识，而非她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事。G村一位生于1934年的妇女说，那个时候我还是娃娃，听大人说生娃把人憋死了。以后再没听说。¹⁰⁴

接生合作化

随着合作化的发展，妇女卫生较少被放在铲除封建迷信的语境中讨论，更多的是作为动员妇女参加集体劳动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来讨论。随着合作社、公社、以及后来的生产队开始负责管理接生工作和记录产假，合作化便改变了接生的管理机制。¹⁰⁵从1951年开始，地方上的卫生部门在妇联的协助下，主要负责为大多数乡镇建立卫生站。这些卫生站与其说是产妇生孩子的地方，倒不如说

¹⁰¹ 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年。

¹⁰² 同上。

¹⁰³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¹⁰⁴ 与于小莉的访谈，2001年。

¹⁰⁵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第47页）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社……要使女社员在产前产后得到适当的休息。”

是个监督和培训的设施。卫生站下派代表到各个合作社去视察当地接生员的工作并为她们的工作提供支援。¹⁰⁶ 合作社建立时，接生员领工分，产妇有 50 天的产假，并按产前三个月平均工分的一半领工分。¹⁰⁷ 成为新法接生员可以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帮助。石翠玉指出，农业社那时候，接生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有点帮助是，你起码工分多一点，高些，你看说 6 分工，8 分工，他们一天就挣上 10 分、12 分，他们是天阴下雨也没有，下雨或者过节也没有，我是常年四季……都有哩。¹⁰⁸ 合作化的最初几年，杨安秀每年接生一百多个婴儿。一开始她每年挣 180 工，后来是 240 工，这样的收入相当于村里挣最高工分的妇女的收入。¹⁰⁹

1956 年下半年，渭南县已经对接生实施了集中计划管理，收集各乡接生新法使用率的数据，并为下一年制定更高的使用率目标。1956 年就已经有几个乡汇报 95% 的新生儿用新法接生，尽管其他乡还不到 50%。¹¹⁰ 然而，当初级合作社合并进入高级合作社时，接生站应该由谁管理的问题变得不明确。有一个合作社以节俭为由，不再给接生员工分，她们一年都没有拿到工分，还不得不自己掏钱买接生用具。¹¹¹ 1957 年，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县妇婴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各个接生站呆了一段时间，试图统一接生员工作的规则和评估接生员的表现。他们发现结果不容乐观：由于 56 年的大量发展组织和训练接生员工作，因时间仓促，致使接生员普遍质量不高。各地都有“四六风”的发生。一些人作风不正，并有贪污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作人员决定根据接生课本

¹⁰⁶ “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工作材料”，1951 年。比如，1952 年的一份妇联工作报告指出，在 1951 年丹凤县卫生处旧为 85 名旧产婆举办过两期培训班（丹凤县妇联，1952 年之一）。到 1953 年秋季，全县有 13 个接生站（丹凤县妇联 1953 年之一）。咸阳县渭滨乡三个接生站的 40 名接生员分布在 27 个乡村（《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女卫生工作情况》1956 年）。

¹⁰⁷ 《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女卫生工作情况》1956 年。各地的做法不一。初级合作社时期的 T 村，接生员直接向接生的家庭收费 1.5 元，并自己留下这些钱而不是领工分；四个接生员组成一组买药并协调她们的工作（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 年）。

¹⁰⁸ 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 年。T 村的李秀兰（1997 年访谈）说，在集体化时期，接生一个婴儿就抵得上七天的工分。G 村的接生员每接生一个婴儿得 10 工分（一般是男人一工的工分），无论接生时间长短。她们不接生的时候，每天一般挣 8 工分（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 年）。在 Z 村，接生一个婴儿得两工（译注：20 工分）。

¹⁰⁹ 与杨安秀（1997 年）、石翠玉（2001 年）的访谈。Z 村的董桂枝（1999 年访谈）跟 T 村的杨安秀一样，在 60 年代每个月接生十到二十例。

¹¹⁰ 渭南县人民委员会 1957 年。这份计划称 1957 年的预定目标在 40% 到 98% 之间。在整个陕西，妇联 1956 年的目标是训练六千名接生员，使新法接生率在全省达到 40% 的平均水平：发达地区达 50% 以上，平原地区达 30% 以上，山区达 15% 以上（妇联 178-164-018 1956 年 [3 月 29 日]）。关于类似的 1957 年的数据，见妇联 178-175-030 1957 年，

¹¹¹ 1956 年，陕西省妇联社会福利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见《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女卫生工作情况》1956 年，亦见《1957 年 7-12 月份妇幼卫生工作安排意见》1958 年。

和当地的实际例子对接生员进行复训。¹¹² 1957年，政府文件中强调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妇婴工作也应该像其他生产工作一样有成就。¹¹³

用生产运动的时间进度来衡量妇女生育健康的进展的做法在“大跃进”时期愈演愈烈。1958年8月，妇联在泾阳县召开了一次全省卫生工作者大会，计划在农村建立产院。¹¹⁴ 陕西省副省长李启明把建立产院列为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卫生工作的中心。他指出，全省农村已经建立了2,626个产院和524家医院，作好了“推动卫生工作的全面大跃进”的准备。他指出，产妇和婴儿在产院呆11天才花6元钱，而在这段时间丈夫可以集齐值30多元的工分，还说，“再以该县1957年住院产妇四百五十一人计算，每人住院平均按十天计，就可节省出照护大力四千五百一十个劳动日从事农业生产。”将生育和产后护理社会化对家庭收入和集体经济有利。

省党委一开始提议在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下，于4个月内在每个乡建立一家医院、每个公社建立一个产院。但在大跃进初期高涨的热情中，会议的组织者们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40天之内，每个乡要有一个医院和一个产院，每个公社要有一名卫生工作者、一名儿童保育员和一名接生员，还要有一个接生站、一个小卫生所和一个托儿所。¹¹⁵ 在泾阳县召开的大会上，T村所在的地区被单独挑出来予以了表扬。据称，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卫生工作者们就已经在每个乡建立了产院。¹¹⁶ 杨安秀工作的产院在T村附近，有三个房间。有两个房间是给妇女生孩子用的，生完后可以在床上休息三天，产妇可以从家里带米来让产院的工作人员煮。第三个房间是托儿中心，安秀不接生的时候就帮一个老师一起照看孩子。¹¹⁷ 会议的组织者们说，这项雄心勃勃的产院计划的关键是要将群众动员起来。但建立产院是一项无资金支持的

¹¹² 渭南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1957年7-12月份妇幼卫生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渭南县1956年的一份计划规定，接生员应该在11月末的农闲时节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培训课程；如果她们以前培训过，则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进修课程。妇女们每天除了上六个小时的课之外，还要独自学习两个小时和进行两个小时的讨论。培训课的重点是如何掌握正确的消毒方法。县政府给每位学员每天提供0.5元的补贴，其中0.4元用于膳食（由雇来的厨师准备），另外0.1元用于取暖和买课本。离B村最近的乡一共有13,018人，打算培训二十五个新接生员并给另外二十五个接生员提供进修课。全县要培训和复训570名接生员（渭南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亦见《渭南县1957年复训接生员工作计划》1956年）。

¹¹³ 渭南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省妇联一份报告气馁地指出，1957年有些地区采用新法接生员的人的数量事实上减少了（妇联178-175-030 1957年）。妇联力图确保每个乡有一个接生站，每个生产大队和新成立的小型公社都配有一个接生员（妇联178-189-010 1958年[8月18-23日]）。

¹¹⁴ 省党委派出代表，表明这项工作至关重要，不能只丢给妇联和卫生局。

¹¹⁵ 妇联178-207-067 1958年（8月18-23日）。亦见《陕西日报》1958年8月31日；《渭南日报》1960年5月21日。这次会议的第二个目标是扩大农村托儿所的数量，这样更多的妇女可以到地里去工作。这个问题在第七和九章有更详细的论述。

¹¹⁶ 妇联178-207-067 1958年（8月18-23日）。此地区为汉中。

¹¹⁷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与杨在同一个地区的接生员李秀兰（1997年访谈）说，产妇可在她工作的产院住七天，每天吃一斤由生产大队提供的大米，还有鸡蛋和油提供。她不用接生的时候就在地里干活。曾帮Z村建立产院的鲁玉莲（1999年访谈）说，是大食堂为产后的妇女提供食物，1960年大食堂一解散，接生站也就关了。有关大食堂，见第九章。

强令，各地也基本没钱去执行这一项命令。尽管会议文件洋洋洒洒，对群众的智慧极尽溢美之辞，但动员群众的具体手段却常常是让每个公社的社员去捐钱建产院。1959年，随着“大跃进”的展开，妇联的人员报告了该省一些产院物资极度匮乏和卫生状况十分恶劣的情况：

产妇住院以最大困难是没有被子。因为不少户都是一家人一块被子，产妇要带走全家就没得被子盖。这两个产院在建院时，由妇女群众集资给各制了一块公被。如果有两个产妇住院，就得盖接生员的被子。

一连产院的卫生很差，房子墙壁很黑，尘土很厚，接生用具乱放。没有做现成的敷料、脐卷、扎脐绳等。药品也不齐全。消毒用的蒸笼放在床下不用已多时了。产院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经费添补药品敷料。点油灯等开支无法解决，产妇住院也不收费。在这种情况下，一连两个接生员就采取给附近养路工人洗衣、做针线、抽空到山上拾桐子等办法赚一些钱贴补产院。她们又提出每个产妇住院收1.5元，添置接生用具及药品。但事实上这样做恐有困难。¹¹⁸

那么这样一来，当集体大食堂散伙并停止给产院提供粮食之后很多产院也解散的现象就并不让人吃惊了。就在产院解散前，产院的产妇人数增加了。G村的妇女在三年困难时期去产院是因为那里的食物比家里的要好。虽然产院那个时候不提供鸡蛋，但是会给产妇定量的面粉和红糖。¹¹⁹T村的产院在1961年停办：办了两年，上面不支持你不行，又要柴火烧水，又要生活，自己又吃饭啦，以后就停了。¹²⁰

60、70年代终于出台了新的制度，那就是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卫生站，每个卫生站配有一个接生员。接生员一般都会到产妇家里去接生。每接生一个孩子卫生站收取一定的费用（T村是0.5元）。¹²¹生产队付给接生员工分。没有妇女生孩子的时候，生产队就派接生员去送汤送药，宣传妇女卫生，给农业科学队帮忙，帮队里喂猪，或帮忙照顾孩子。有些村的接生员定期去产妇家里为她们进行产检，因为很多妇女都还不习惯去医院甚至去村里的诊所检查。¹²²但一直到合作化末期，让产妇集中到一个容易去并且方便去的医院生孩子的做法才开始兴起。

除了提供接生服务以外，合作社还要保护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合作社的规定明确要求哺乳期的妇女应该被分到离家近的田里去劳作，以便她们有时

¹¹⁸ 妇联 178-211-005 1959年。

¹¹⁹ 与石翠玉的访谈，2001年。在T村，只有接受新法接生的妇女才享有这样的定量，即使新法接生是在家里进行（与钱桃花的访谈，1997年）。

¹²⁰ 与冯素梅的访谈，1997年。

¹²¹ 我本人2008年11月9日与高小贤的交流；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李秀兰（1997年访谈）说，给生产大队的妇女接生一次收费0.7元，不是大队的则收1元。据安秀说，这个价格一直从高级合作社时期维持到改革早期。当时价格涨至2元，归接生员所有。后来价格开始飙升：有几年是3元，然后是5元，并一直持续到90年代，再后来是10元，最后到了1995年则是15元，如果需打针止血的话，就还要多交20到30元。据说，1997年T村在医院生产的妇女（杨安秀估计占总数的40%）要花费400到600元。与此同时，生产大队的接生员人数从两个上升到七八个，受计划生育限制，90年代每户家庭的婴儿诞生数量减少了。然而，尽管接生的价格上涨了，接生员在医疗方面的继续教育却中止了（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¹²² 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间喂孩子。应该给怀孕超过七个月的妇女安排更轻的工作，不应让她们肩挑重物。县妇联宣传了一些因为让孕妇抬沙土或干其他重活而导致孕妇流产的例子，警告说要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¹²³ 妇联提出了一项名为“三调三不调”的政策：“月经期调干不调温，怀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¹²⁴ 身体强壮、没有孩子、家务活计不多的天足妇女被调到更远的田里或山里去劳作。身体更弱、有孩子或家务繁重的妇女则被安排到附近的田里劳作，工作的任务也更轻。¹²⁵ 每个合作社有个妇女队长负责为经期或怀孕的妇女安排更轻的工作任务。在 T 村，每个育龄期的妇女都有块写有她们名字的牌子挂在生产队里，行经的妇女如果要申请更轻的任务可以自己把牌子翻转过来。¹²⁶ 争取工分的需要通常使得妇女们不会提出这类请求。但给每个妇女挂一个名牌这一举动建立了一种规范，即一个妇女的生育状态关系到集体利益。几十年之后，随着国家颁布的严苛的计划生育法令，这一规范将会成为冲突的根源。¹²⁷

从 1958 年起，妇女就享有产前和产后各一个月的休假资格。但如前一章所表明，很多妇女都享受不起这些福利：那还是给例假哩，咱这家贫些就不敢做，只能给我的轻生活，大的活了让别人去做，你凭分吃饭哩。¹²⁸ 必须在田里劳动有时直接影响到生孩子。¹²⁹ 杨安秀讲了在一个在不断宫缩时还跑到地里去多挖几行土豆的年轻妇女的故事。安秀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妇女坚强能干，而现在的年轻妇女在生产前却老喜欢躺在床上，无法同她那一代的妇女相比。然而，大家普遍担心的工分问题还是从故事里渗透了出来：我说别挖了，回去。“哎呀婶婶，子门（那么）我当生了，喔一个白不得做活咋

¹²³ 《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情况》1956 年；丹凤县妇联 1957 年之一；与钱桃花的访谈，1997 年；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 年。

¹²⁴ 与王梅花的访谈，1996 年。关于这项政策如何在地方上展开以及 1956 年丹凤县妇女要求履行的任务，见丹凤县妇联 1958 年。

¹²⁵ 丹凤县妇联 1957 年之一。有些县的妇联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将妇女分成三个小组：（1）年轻且身体强壮、没什么家务活、没有孩子或孩子很少的妇女；（2）身体强壮、有家务负担和孩子，或处在怀孕初期的妇女；（3）上了年纪或体弱，家务负担繁重或有很多孩子，有小病，或处在孕期的妇女（渭南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8 年）。亦见妇联 178-164-018 1956 年（3 月 29 日）；妇联 178-175-030 1957 年（12 月 31 日）。关于全国对这一问题的评论，见《人民日报》1956 年 8 月 2 日。陕西省妇联在其 1958 年的计划中重申了“三调三不调”的必要性，还提了一个“大脚上山、小脚在平川”的口号（妇联 178-189-010 1958 [3 月 11 日]）。

¹²⁶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 年。省妇联一份 1957 年的工作报告证实，有些地方用怀孕登记表格和经期牌来帮助妇女领导安排工作任务（妇联 178-175-030 1957 年 [12 月 31 日]）。

¹²⁷ 魏台玉（White）2006 年，葛苏珊、温克勒（Winckler）2005 年，葛苏珊 2008 年是近年来有关计划生育的优秀著作。魏台玉回顾了计划生育的起源，见第一、二章，第 19-21 页，及魏台玉 1994 年。葛苏珊和温克勒追溯了从 20 世纪初到毛时代的人口政策的形成及其社会和政治影响。葛苏珊集中研究了后毛泽东时代初期被赋权的火箭科学家们如何不可思议地发展了计划生育政策。葛苏珊 1990 年、1993 年、1994 年，以及葛苏珊、李家立（音译）1995 年论述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展开及其在中国农村引发的冲突，其中包含了大量来自陕西农村田野工作的数据。

¹²⁸ 与马丽的访谈，1999 年。

¹²⁹ 高小贤 2000 年：第 172 页。

个家呀？不咋的。”我说淑平你这个洋芋恐怕挖……挖一两路看你挖的出头吧？我看她直是上厕所，，就象我们进来这一下都上五六道。最后我说淑平你别挖了，挖到这一种你捡了，捡了你临时挖掘，算挖算（一边）捡，这个挣工不到这高（里）头。我说了她说“不咋的、我起码还能挖两三路子”。我考虑这个事情还不要紧到的。最后都破了，破到田沟沟里了，都没法了。我把她挽上，挽到回去，我回去把手还没洗毕，她娃头都见了。¹³⁰ 挣工分的迫切性也影响了坐月子和产后恢复，使得妇女们往往休息不到一百天就回到田里去劳作。产妇一般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恢复身体。很多妇女在讲述中都抱怨自己由于产后休息不够而患上了关节炎和其他病痛。这些病症在她们年老的时候加剧并折磨着她们。¹³¹

妇女生殖健康中的避孕在农村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1956年，中共政府开始在农村地区宣传避孕，此举比独生子女政策的出现早几十年。¹³² 陕西省卫生局和妇联带头开展节育工作。干部们参加县里和乡里的会议去学习有关避孕套和子宫帽的知识，然后回到家中向当地的妇女宣扬计划生育的好处，告诉她们生更多的孩子意味着她们的负担更沉重。¹³³ 卫生局的官员让工作者们也向男子宣扬计划生育，“达到双方合作”。¹³⁴ 县妇婴诊所和医院也被要求出售节育工具和药物，虽然这些活动在1956年仍处于试验阶段。¹³⁵ 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势头有所减弱的时候，妇联召集干部去学习节育政策，制定个人生育计划以树立榜样，并向农村妇女提供避孕方面的指导。¹³⁶

干部们虽然展示了一些避孕器具的样品，却没有把它们分发出去。卫生局的工作报告表明，很多村民都将避孕看成是不道德的行为，认为一个人有多少孩子是命定的。卫生局还警告道，宣传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应该避免“流于庸俗化的偏向”。具体是什么偏向并未说明，但是很明显大家对公开谈论两性关系感到不自在。¹³⁷ 卫生局还提议每个诊所收集每个请求节育的妇女及其丈夫的名字、年龄、从事的行业；她的生育和避孕历史；她想要避孕的原因；提供给她的避孕方法的效果。这次早期的试图收集登记避孕妇女有关数据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广泛实施。¹³⁸ 但在G村当妇女干部的张朝凤说，一开始的

¹³⁰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¹³¹ 与周桂珍（1996年）、冯娜（2001年）、刘存雨（2001）的访谈。

¹³² 1956年9月11日，陕西省有关当局传达了卫生部发布的一项通知，通知说“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政府应准备一切条件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陕西省卫生厅1957年）。

¹³³ 与张朝凤的访谈，2001、2004年。1956年，省卫生厅培训了53名卫生工作者去教妇女们如何避孕（陕西省卫生厅1957年）。

¹³⁴ 陕西省卫生厅1957年。

¹³⁵ 《1957年7-12月份妇幼卫生工作安排亦见》1958年；陕西省卫生厅1957年。

¹³⁶ 妇联178-189-010 1958年。关于党内50年代初对是否要鼓励计划生育的论争、以及从50年代中期鼓励个人计划生育到1956-57年鼓励全国计划生育到“大跃进”期间计划生育的中止，见魏台玉1994年，1996年：第5-7页，19-41页；葛苏珊2008年：第53页，56-58页。

¹³⁷ 陕西省卫生厅1957年。

¹³⁸ 同上。

避孕宣传并未收效。那群众还不习惯，还有些人还就骂得，说是你管的多了，还管人生娃，有不要你养，你不要你咋。¹³⁹然而不久后，这种态度就会改变。得到提升之后的卫生护理条件成功地减少了婴儿死亡率。在合作化的整体环境下，不断增长的孩子数量给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困难，给妇女带来了沉重的家务负担。

超越运动时间：接生的故事

绝大多数陕西婴儿继续在家出生，除了一部分是由接生员接生以外，大部分由婆婆接生或者自己接生。一直到合作化时期，一些家庭负担不起或者不需要接生员，也并不是每个村都能容易地请到接生员。很多妇女讲述了自己接生孩子的事，自己剪断脐带，包好孩子，而这时她们的邻居则在集体的田里劳作，听不到她们生孩子，又或者是产妇的丈夫赶去叫接生员，而接生员还没赶到。¹⁴⁰G村的刘谷雨在刚把午饭的馒头放到蒸锅里，第五个孩子就出生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馒头都还没蒸好。¹⁴¹

有的妇女生孩子的时候不愿意有外人在场，连接生员也不行。一天，正在受训的接生员马丽收到一条紧急消息，说她表嫂正难产。表嫂前一年刚死了一个婴儿。马丽跑到她师傅家求助，师傅是个经验丰富的接生员刘西罕。师徒俩连忙赶到马丽的表哥家。尽管是她婆婆找的接生员，表嫂也不愿见到她们。分娩时宫缩的间隙，表嫂责骂了她们。人家说：“难受，生个娃叫你都来看一下。你是看把戏哩吧？”噢，人家就不叫你到跟前去，去就坐了几个小时。人家不让看，那老婆[刘西罕]就说：“厉害啥哩，给你办好事来了，都是妇女么，看啥来了。”等到表嫂愿意让接生员帮忙的时候，为时已晚了。娃的一个胳膊在吊着哩。老婆把她弄上炕，把胳膊慢慢送上去，送上去，又下来了，那老婆就说是这个娃成不了。娃一个胳膊下来了，头在里头弯着哩，最后弄下来就死了。¹⁴²

除了显而易见的痛苦和危险以外，生孩子还是新娘融入婆家的转折点。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关中和山南的妇女在婚后经常回娘家，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星期。但在娘家生孩子却是禁忌。¹⁴³如果母亲觉得在娘家探亲的女儿可能要生孩子了，她就会急忙把女儿送回婆家去。¹⁴⁴母亲若是给自己女儿叫接生员，就会受到女儿的婆家的严厉批评，甚至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也会归咎于她。¹⁴⁵当地人相信：“亲妈生死都不见……死了人家不见那种瘟气，生了也不见。”禁止母亲帮女儿接生孩子的做法也延及招赘婚姻中跟母亲一起住的妇女。由于母

¹³⁹ 与张朝凤的访谈，2001、2004年。

¹⁴⁰ 与周桂珍（1996年）、康汝清（1997年）、钱桃花（1997年）、何改珍（1999年）、刘谷雨（2001年）的访谈。

¹⁴¹ 与刘谷雨的访谈，2001年。

¹⁴² 与马丽的访谈，1999年。

¹⁴³ 与赵凤娥的访谈，1996年。

¹⁴⁴ 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年。

¹⁴⁵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亲不准来帮忙，而一个来帮忙的亲戚则因要在新年做饭不愿因接生而沾上血污，何改珍只好自己接生。人家毛娃身上光太哩，人家那我一捉哩，人家咕咚一声给滚到水盆子里，喝了口水，她鼻子嚷了一百多天。¹⁴⁶

无论从礼俗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通常妇女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不能常回娘家了。这也通常是婆婆全面掌管儿媳生活的开始。1949年前后的接生故事中，婆婆一直扮演着主角，她们的形象也通常不是什么正面的形象。许多妇女都将流产归咎于跟她们跟婆婆或者是夫家年长的妇女之间的肢体或情感上的冲突。¹⁴⁷许多妇女在回忆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首先提到的不仅仅是恐惧和痛苦，还有婆婆、丈夫、或者二者的冷漠和袖手旁观。本书第四章提到的积极分子、后来离了婚的李六斤，就曾因为她的政治活动而跟夫家数年不睦。她两次生孩子的经历，第一次是在40年代后期，另一次是在解放后，都显出她对丈夫和婆婆的强烈不满：我生我们头一个女子时是十七岁，发作了那天黑了我们在一个床上睡到的，都没有人说，最后人家去割柴呀，我还起来给做饭，扒到锅头上搅锅的时候都疼的没法，最后硬几个三下把饭 kong2（汤滤干）了，饭蒸上，起来吃饭时，我也没说，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要生了嘛，我也没说过。

最后他走了，发作，到堂屋里转出转进的走。肚子疼的没法，那才十七岁嘛！所以转了一些，走了一些，到吃早饭的时候呢，都生过小孩的吗，肚子疼的不得了，憋到生不下来。

安到板凳上，把屁股嘛坐到抵，…不能睡！有个啥法呀，天老爷！一坐呀都要命。最后就喔个家转出转进走。疼的没法，一直疼到下午阵了没法。我那时当女子家时听到人家说，生月娃的时候了嘛。奔了后了睡哩。人家又说的睡不得，睡了趴到心上去了。想了想，说，死活管他去，我来睡，我呕气趴到我床上去，展展的睡到床上，睡到床上是，一下逼了两 gang2 子（阵子），挣了两阵子，月娃到前头来了，奔到前头来是。叮叮咣咣挣了两阵子，月娃滚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老婆婆弄了个木盆舀了点水来。给我搁到床边上，给了我个剪子，我自己一些把月娃子脐带一较，挽了几个疙瘩，给了一坨套子（旧面花）扒到高头，我提前也准备了。弄了些布布，袋袋包到起，月娃一洗包到，弄了个裤子布。Yi 子（胎盘）是自己落了的，就是喔。

人家〔丈夫〕割柴的还没回来。你说按这当乎这个夫妻噢。那都有了觉得说一下子，夫妻感情就这个球势呢（样子）？我没说他也不知道。就这个样儿来！这是生头一个小孩这个样子。

¹⁴⁶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¹⁴⁷ 与周桂珍（1996年）、王西芹（1996年）的访谈。

生第二个娃儿时，到喔守谷子，我们 bá 了个铺，守谷子呢。肚子又疼了，我就趴起来。跟到那一样，水一破，又奔后了。我就进睡房里去。地下给了个一扫，展展睡到地下，睡到月娃落了都才爬起来。你还说！这个事情啦，睡到地下，最后娃儿落到地下了，才趴起来拣月娃，才抱到床上去。你说那当乎就这样儿！¹⁴⁸

我们无法从官方资料和农村妇女的个体生育故事中知道这种家庭关系有多普遍，也无法知道这种关系是何时发生转变的。50年代有些年轻妇女积极分子在她们组织工作的过程中了解到了新法接生。她们有信心——或许也有外界支持——要求接生员照顾她们生孩子。¹⁴⁹当像李六斤这一代的妇女描述她们儿媳的生育经历时，她们提到的是医院和昂贵的医疗费用，并说没有像她们那样干过重活的妇女在第一次生产时更困难。这些人中的接生员也说讲了她们最近接生时遇到的难产的情况。她们村里的妇女生孩子已经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新妇通常也不跟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更不用说受婆婆掌控了。但还是难以想象这类家庭关系的变化会像接生方法的变化那样快。生育行为不仅受到国家运动的制约，还受到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因为接生员和产妇都无法脱离这种关系。¹⁵⁰像下面有关接生员刘西罕的故事所表明的，这些关系超越了看得见的农村社会关系而进入了看不见的灵异世界。

刘西罕和有关生育危险的魑魅魍魉

接生员刘西罕大约在1906年出生于西关村一个后来被划为“地主”的家庭。七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帮母亲干家务活和接生。十四岁时，她嫁给了一个后来是中农的家庭，并搬到了Z村，在家织布。1949年前，她就开始在Z村接生。解放后，她成了积极分子并当上了农会一个组的组长，还加入了妇联。她接受了接生培训，并于1952年2月成为Z村接生站站长，该站是妇联在该县建立的13个接生站之一。在她当站长的三年期间，有8个人在她手下工作。到1955年为止，她接生了41个孩子，无一例四六风，产妇也没有得产后疾病。¹⁵¹她在乡亲中的威信很高。何改珍觉得她1953年生的孩子之所以死于败血症就是因为不是刘西罕接生的。她第二年生的二儿子是刘西罕接生的，就活了下来。刘西罕接生从不收费，乡政府给她发接生器具的费用。¹⁵²

刘西罕积极宣传新法接生，还唱歌歌颂新法接生的好处。¹⁵³她在其他各方面也是个模范公民，1954年还说服她丈夫和邻居把余粮卖给国家。由于她宣扬并不受欢迎的统购统销，她一个邻居骂道：“刘西罕，你把我的锅提去，把

¹⁴⁸ 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她第二个孩子在11个月时死于“夏麻子”。后来李六斤离婚时（如第六章所述），她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

¹⁴⁹ 与冯素梅的访谈，1997年。

¹⁵⁰ 有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村的生育文化，见李银河1993年；高小贤2002年。

¹⁵¹ 丹凤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95年。有关该县复训的接生员人数及接生站数量，见丹凤县妇联1952年之一，1953年之一。

¹⁵²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¹⁵³ 丹凤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95年；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我的被子拿去，我吊死你门口去。”但一份关于她模范行为的报告称，她仍然十分耐心地劝导邻居，不停跟她讲旧社会粮食多么匮乏，直到这个老妇人最终作出让步把余粮卖给国家。从各方面来讲，她似乎都是党和国家塑造的新一代农村妇女的典范。¹⁵⁴

然而，当农村妇女忆起死于 50 年代末或 60 年代初的刘西罕时，她们的记忆却比官方出版物和内部资料白描的关于安全接生（和统购统销）的内容要复杂得多。尽管农村妇女称赞她新法接生的技巧，但她们也认为刘西罕和所有给人接生的人一样，在婴儿出生时会遇到很大的危险。据她们讲，生产不仅威胁产妇，对接生的人也同样不详，新法接生也无法驱除这种不详。

村里人认为生产时的血污对接生的人和她所接触的人都不吉利。马丽记得自己帮刘西罕接生之后带回家一些黄瓜，但谁都不敢吃：“[人家说]她脏的太太，你没看她做啥去了呀，说笑的说哩，笑哩，拿的东西都没人吃了，我就不喜欢了。”¹⁵⁵ 据另一个妇女回忆，刘西罕的前任也是一个技术高明的旧产婆，但是由于经常接触生产的血污，导致眼睛瞎了。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妇女拒绝了刘西罕教她接生的提议：我这眼睛不太好，我不学这。学这血气扑眼睛，我不学这。¹⁵⁶

即使在解放后，即使在设立了接生站刘西罕当了站长之后，即使在消毒得到普及和四六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接生的不详还是没有消失。最后，人们说，刘西罕是“接生给接死了，把命给送了”。有次接生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接下了一个畸形又奇臭无比的东西。¹⁵⁷ 接生，到那把那娃，看她掉下地以后，不知道是娃不是娃。她吓地那一晚就发高烧。第二天才给她屋里娃带信，这娃子去把他妈抬回来的，像这下午，恩，象是我来这时候回来的，到下午四点，就没气了，就死了。哦，那个老婆呀，人家接生接的好太呀，谁要是一喊，那应声得很呀，人家说那人受罪着了么，一喊，她说我就走。¹⁵⁸

这不是刘西罕之死的完整版本。在她死前几个月的一天，她向同村的一个女人透露了一个闹鬼的故事，并让她发誓保密。这个人是这样回忆的：还有那一年，她下来给我说，我到底都没敢给人说过，人家说，“改珍呀，我都不敢说，你可不敢说哇，说了人家政府明儿斗我哩”。那黑上有个人，小伙子，在她

¹⁵⁴ 丹凤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5 年。

¹⁵⁵ 与马丽的访谈，1999 年。关于产后血污的观点，亦见芮马丁（Ahern）1975 年。

¹⁵⁶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 年。

¹⁵⁷ 费侠莉（1999 年：107 页）指出，在宋代的信仰中，妇女妊娠与鬼魂密切相关：“尤其是对怀孕的妇女而言，灵界充满了鬼胎，这些胎儿要么是流产的或被堕胎的，要么是死胎或一出生就被弄死。这些胎儿可能会在孕妇的周围游荡……使其分娩极为痛苦或诞出怪胎。”吴一立（2002 年：第 188-95 页）追溯了中国古典医学对鬼胎的论述，鬼胎被认为是一种假孕，是人与鬼交媾或妇女性生活不如意的结果。

¹⁵⁸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 年。

窗底下喊她哩说，婶子，给我接生，就说这两句，她说哦，来了，她就穿衣起来，把那药箱子背上。

人家说那小伙子给它背上，就那……东坡坡那儿，回去后，没拿包包（药箱），上面写的有十字，划的那十字。老汉到第二天说，呀，你那包包咋没背呢？人家说，人家说，娃，你给我倒一点儿水叫我把手给洗下子。人家说，婶子，那没有水呀，人家说我还没有啥给你做点吃的。〔刘西罕说〕我不吃，你叫我给手洗一下子，我不吃你啥，你把我手洗一下子。人家说没有水她就到人家那石头上擦擦，摸摸后，就回来了。

药箱子，老汉去寻了。在人家那家坟头上。那血手摸到人家坟头上，那石头上，她吓的回来看数（只）给我说，她就不敢给别人说，给人家说，公家斗她哩，嘿，公家斗哩。吓地不敢说，这是迷信，给人家……给人家阴间接生去了，某老婆没多长时间到那接生，就把命送了。¹⁵⁹

在这个故事中，这个新法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出去接生。这种精神不但为她同时代的接生员所共有，还被国家的出版物所赞扬。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那带有红十字的医药箱不见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都表明有什么事很不对劲。她不知道她把医药箱带到了幽冥之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尽管她是以个体来经历这种恐惧的，但反应的却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群体恐惧，许多中国的神怪故事几乎都有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情节。¹⁶⁰

然而刘西罕的恐惧还不止这些：她还害怕她的恐惧会被当作迷信遭到批判，因为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科学的世界和一套关于接生员的旧观念碰撞到一起，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能讲的就只能是科学。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基本沉默。不久以后，阴魂不散的鬼魅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关键不在于是否妖魔鬼怪真的要了她的命，也不在于是否重复打击加速了她的死亡。¹⁶¹ 我们无法知道她自己是否将这两次带给她创伤的接生联系到了

¹⁵⁹ 同上。

¹⁶⁰ 余华在其短篇小说《世事如烟》（1996年：第87-93，104，109-10页）中也采用了这一主题：一个接生婆在接生了一个鬼婴之后死了。他可能凭借的是可追溯到唐代（618-907 C.E.）的鬼故事主题。我对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提醒我刘西罕的故事为何如此熟悉深表谢忱。有关17世纪的中国小说中反复出现“男人使女鬼受孕”这一主题，见蔡九迪（Zeitlin）2007年，尤其是第一章。怀特（2000年之二：第19页）写道：“当人们接受流传的故事并将它们转化为个人的故事时，他们并不是在编故事：他们在指控和自白中运用强大的、共有的词汇。词汇是共有的这一事实给了指控和自白力量。它们是真还是假无关紧要。”

¹⁶¹ 我的目标并不高：我想探索鬼魂和鬼故事对刘西罕的生活和死亡、以及那些记得她的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怀特2000年之二讨论了肯尼亚的类似的问题。根据刘西罕的死亡时间——死亡日期尚不能确定——关于她的故事里鬼魂的存在可能也映射出20世纪60年代初的情况，当时Z村尚未从“大跃进”后的饥荒（见第九章）中恢复过来。木克尔（〔Erik Mueggler〕2001年）在研究云南的彝族地区时指出，大饥荒造

一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妇女们记得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技巧，她对新法接生的投入，她的热情，还因为她是接生死的。就像一个采访对象说的，刘西罕“接生给死了”，而这个采访对象本人在 50 年代也是个积极分子。

对建国初期的妇女来说，生孩子的阈限性和危险在 50 年代就像需要消毒医疗器械一样真实，而且在 90 年代的记忆里也仍然真实。¹⁶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妇女的确按国家时间生活——她们激动地说起那些运动对她们生活的改变。然而国家时间与其他时间共存，或者说国家时间按照其他时间的反面来定义自己，而其他时间却并不因新的国家政权的降临而消失。

国家当局讲述的标准的生育改革故事，有关调查小组的传说，雄心勃勃的策划者们，以及模范接生员都无法完全涵盖“接生员”这个主题。部分是因为国家没有一直关注妇女的生育健康，其注意力常常被其他互相冲突的需求分散或淹没。嵌套在家庭关系中的生育与其说是线性的，倒不如说是不断出现的、不连贯的，而国家亦不能用已有的生产指标和向现代性跃进的范畴，简单地将生育纳入运动时间。但这些标准故事中的记录也不充分，因为知识、观念和行为以复杂的方式流动扩散，是“国家是科学知识传播者”这一模式所无法捕捉的。这也表明，要全面历史地理解农村生育和接生以及 50 年代的中国农村，当然需要完整记录国家运动，也需要探索妇女的记忆——那些她们愿意并且能够讲述的记忆。

成大量人口死亡后，“野鬼”以及安抚“野鬼”的需要困扰着村民们，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 2006 年）在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谣言现象时指出，中国很多都市谣言都是关于鬼在人间游荡的。他认为，当人们说有很多鬼时，这表明了“对死者的社会控制失败了，也表明人类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边界不稳定”（第 419 页）。他认为饥荒可能使游荡鬼魂的故事愈演愈烈。

¹⁶² 我们的助理也有同感。她当时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她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一连数天无法入睡。